

• 科学随笔 •

科学允许奥妙的存在，但并不是法术；允许超过极限想象的奇特现象，但并不是咒术或魔法，更不是廉价的戏法……对奇特现象的探索，本该激发人们对真科学的兴趣。从伪科学的流行来看，人们对奇特现象的感觉是广泛而有深入基础的，但常常也被误导和滥用。

——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讲座教授)

探寻理性思维

——浅析为什么有人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尹 传 红

一、从一个可疑的 UFO 事件谈起

2005 年岁末，《飞碟探索》编辑部转来一则源自“人民网—江南时报”的消息，希望笔者能作个简单的评论，或“较宽泛地谈谈”UFO 问题。

这则消息的标题是《我国东北三省多人目击 UFO 闪现》。文中称：9 月 25 日晚，长春、公主岭、通化、汪清等地都有人目击到“类似彗星的不明飞行物”和“螺旋状飞行物”。一位 UFO 资深研究者在仔细了解目击者提供的信息和图片后，认为这两次出现的 UFO 均为实体，很可能来自地球之外。

不是目击者，也没对 UFO 问题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仅仅凭借以上粗略的信息，笔者当然是不敢妄下结论的。至于一位据说研究 UFO 已有 30 年的资深人士所言：“从发光强度和高速度上看，很可能不是地球上的东西，很可能是外星探测器之类。”我觉得也非常可疑，尽管他老人家用的是猜测的语气。

对这个问题笔者之所以变得谨慎了（这么说，是因为原先并不是那么谨慎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央电视台不久前播出的一个解谜专题片给笔者带来的震撼，而这事儿碰巧又与东北和 UFO 相关。

话说今年 5 月 21 日晚，东北一家药厂从其录像监控设备中突然发现显示器上有一道白光迅速闪过。回放时认定，监视器拍摄到了 1 个长约 3 米的长条形飞行物迅速飞过厂房上空，飞行时速达到了 200 公里以上。从外形上看，飞行物显然不是人造的，气象部门也排除了闪电的可能性。1 个星期之后，神秘的“飞棍”又在药厂上空出现了。

您可能想不到，最后是北京的一位 UFO 研究者亲赴现场，揭开了“飞棍”的谜底：原来是摄像镜头的光学机关在作祟。您只须将摄像机的拍摄快门速度略加调整，

那些在镜头里出现的原来正常飞行的各种小飞虫，霎时间就变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飞棍”。所谓“飞棍”的出现，不过是摄像机造成的假象而已

二、“投人所好的推论”

这里不妨就 UFO 这个话题说开去，“较宽泛地谈谈”。

首先提请大家注意：UFO 现象的一大特征是阶段性地被目击，而且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有时，只要报道了一件非常轰动的 UFO 目击事件，然后突然就会有十几件类似的报道随之出现。

世界上最早的一份 UFO 报告（于 1874 年）出自英国这个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并非偶然。当年那些频繁见诸英国报端的 UFO 事件，还有上个世纪 30~40 年代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不时出现的 UFO 报告，现在大多可以用“污染下的气象效应”以及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其它科学知识来合理地进行解释。也就是说，这不过是一种受到目击者臆想、曲解了的自然现象或地球人造物体而已。

近几十年来，由于科学幻想小说的流行、外星生命假说的兴起、传媒对 UFO 事件所作的猎奇性渲染，以及“主流科学家”对 UFO 问题的漠视或回避，更激起了公众对于 UFO 的热情。

然而，就笔者所见，如今 UFO 问题已经被一些执著的“探索者”神秘化了。许多 UFO 的调查者宁愿花费时间收集表面上神秘的 UFO 故事，也不愿花费力气寻找简单明了的现实答案；而它常常又跟一些毫无根据的想像、幻觉以及谎言和欺骗搅合在一起，以至于成了一个缺乏实证、太过虚幻、具有“伪科学”倾向的“现代神话”。

不过，关注 UFO 现象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这一现象与科学研究也绝不是互相对立的。因为前者具有构成科学之谜的所有要素，而即便是由它所生发出来的那些离谱想法、观点乃至社会思潮，（作为“反面教材”）也并非没有探究、思考的价值，何况围绕它也确有现代科学尚还不能解释清楚的一些方面。

再说，它所留下来的某些“悬念”，对于激发公众关注科学的热情和增强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应该也是有所助益的吧！对解谜飞碟之类的爱好，往往促使更多的人对科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也是广有共识的。当然，也常有走火入魔甚至编瞎话的事情发生。

可以从更多的侧面去看待 UFO 现象，心理因素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例如，国外有天文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曾谈到，应从心理学方面寻找关于 UFO 的解释的影响，他们认为：人们对 UFO 现象的关注，不过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宗教的需要”；人们“希望看到” UFO 或外星人，也许“对一些人来讲有较深的根源，几乎带有宗教的意味。”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在《来自天空的神话》一书中也认为，对 UFO 狂热痴迷是人的—种精神现象，那个不明飞行物不在天上，而在人们的心里。还有一位心理学家称：认为 UFO 是地外来客的信念是一个“投人所好的推论”，因为它“有一种似乎真

实、引人入胜的味道”；而且，“如果是真的，就会使人生更有趣味”。

应该承认，的确有着这样一个群体——不妨就称之为“神秘主义者”吧，他们满足于对奇妙的享受，满足于对神秘的沉湎，认为对神秘的探究没有任何意义。您不难从这类人身上体悟到一种浪漫主义情怀。举一个例子：英国著名诗人济慈不喜欢科学，他抱怨他的同胞牛顿对彩虹的解析破坏了其所蕴含的诗意，彩虹在这位物理学家眼里只不过是光谱的排列而已。许多 UFO 的“追随者”乃至痴迷者，对 UFO 也持有类似的心态。

相传孔子不谈论神秘主义事物，故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语。可是，数千年之后，在科技昌明的今天，却有许多人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甚至谎言，进而滑入了伪科学和迷信的泥沼，这是为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增强理性认识，摆脱轻信、盲从和受愚弄？在科学的导向方面，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能够且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三、以“科学”的名义

1996年，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其反伪科学名著《魔鬼出没的世界》中写道：

无知，特别是对自己本身的无知，有更多的可能性造成不可避免的人类苦难。在这个千年即将结束之际，伪科学和迷信似乎越来越具诱惑力，非理性的海妖的歌声更加悦耳迷人……我担心，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习惯会控制我们的一切。

萨根的担心不无道理。

人类已经迈入 21 世纪，科学已经创造了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诸多奇迹。然而，与此相伴的是，迷信和伪科学至今仍大有市场。它扰乱了人们的意识和思想，使人们感到惶惑、迷惘……正如萨根所说：科学还不像许多人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样，已经成为可以驱除黑暗的太阳或者其它明亮的东西；科学在伪科学泛滥、迷信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下，仅仅是一支随时都可以被吹灭的蜡烛。

就在萨根写下这几段话 4 年之后，即新千年到来之时，《科学世界》杂志社分别在京沪两地共 8 所高校和中学，对部分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和中学生共 377 人进行了一次随机的问卷调查。在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在日常阅读中，你能否区分科普著作、科幻作品、神秘故事和宣扬有神论的著作之间的区别”——时，学生们的自我评价令人相当乐观：在回收的 377 份答卷中，185 人回答“能够”，占总人数的 49%；136 人回答“不完全能”，占 36%；而承认“不能”区分的只有 12 人，仅占 3.2%。

事实果真如此吗？接着在对其它问题的回答中，就出现了与答题者的自我评价颇为矛盾的答案。在回答“你认为金字塔是外星人造的吗”这一问题时，称“是”或“可能是”的共有 151 人，占 40.1%；在回答“你相信有关通灵术的说法吗”这一问题时，称“相信”或“有点相信”的共有 204 人，占 54%；在回答“你相信飞碟的存在吗”这一问题时，称“相信”或“有点相信”的共有 240 人，占 63.7%。

上面这些数字令科普工作者震惊不已,他们不禁发出疑问:这些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平时读不读科普书?更令他们忧心的是伪科学与科学在我们的书架上比肩而立的状况,如《水晶头骨之谜》、《上帝的指纹》之类的伪科学图书,近年来已经以“科学”的面目,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各类科学出版物的书架上。它们以想像代替科学,以“科学”的名义宣扬神力,以“科学”的方式解释神秘现象,以“科学”的精神质疑现代科学,并且还“拓展”和占据了不小的市场。这一事实昭示我们:作为科学精神核心的理性并没有在我国公众的头脑里深深扎根,我们的社会还远不是一个理性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任重道远。

又一个4年过去。2004年6月19日,中国科协公布了“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根据国际上通用的科学素养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进行统计和计算,2003年,我国公众达到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为1.98%,比2001年的1.4%增长了约0.6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在稳步增长,但是与美国、日本等相比还处于落后地位。”可以作为比较的一组数字是:2000年美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平达到17%,1991年日本公众科学素养水平为3%,1989年加拿大公众科学素养水平达到4%。

不过,对美国咱也别“迷信”。2004年5月,美国《大众科学》杂志登出《生活中的伪科学》一文,以作者的亲身体验和感悟,揭露了一些产品以所谓的“科学宣传”欺骗、愚弄消费者的行径;同时,对美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也提出了质疑。作者写道:

去年10月15日,我刚一起床就抄下了13条科学宣传的内容。其中只有关于某种麦片的还稍稍有点科学根据,其它的就完全是信口开河了。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在2002年进行的一项关于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中发现,只有1/3的美国人“充分理解某项科学研究的含义”。或许正是由于公众科学素养的缺乏,才使得那些不负责任的科学宣传以每3分钟新增2条的速度迅速蔓延。在美国,民众很容易受到伪科学的误导。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经过调查指出,是教育系统和媒体不负责任造成了这样的现状。

他的结论是:“对科学一知半解的人,很容易被‘科学宣传’所吸引。”

四、科学伪装下的“常识”

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的说法和传言,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却常常在“科学”的名号下,被我们作为“常识”接受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看来颇为偶然、巧合乃至神奇的事件,其实却是普通的现象、必然的规律……不要小瞧了那些“有趣的”奇谈怪论。它会利用一些人的无知和好奇,在受众心目中培植错误的观念,进而将人们引入愚昧的歧途。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媒体和教育界对那些奇谈怪论并不总是具有免疫力,他们有时竟然也会成为伪科学、迷信和一些无聊说法的传声筒。

2004年夏,新华社在两周内曾先后播发了两篇与此相关的报道。

其一是8月28日发自广西北海的“新华时评”：《报纸岂能为伪科学张目》。文中说：彩票中奖本无规律可循，现在却有不少报纸在彩票专版、专栏中刊登“选码技巧”、“赢奖秘诀”和彩票走势分析等等，还让“中奖者”现身说法。这种无中生有、故弄玄虚的做法，不仅有违大众传媒的道义责任，而且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更有甚者，竟向读者推荐中奖号码组合，似乎照单买彩票，就能中大奖。有人中吗？有。但这并不等于你摸到了规律。看过福利彩票开奖的人都知道，几十个号球，在一架机器里搅和一通后逐个弹出、随机变化。这种现象在统计学上叫“独立随机事件”，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号码的出现，都不为其它号码所决定。所以，一些报纸上所谓的赢奖“技巧”、“秘诀”，如果非要往“科学”二字上靠，也只能算是伪科学。可怜不少彩民拿伪科学信以为真，竟根据报纸上所谓的彩票走势图猜单数双数、辨冷码热码，把每期号码分析来分析去。

其二是9月5日发自兰州的一封记者来信：《警惕“包装”后的迷信》。信中说：在兰州，以“科学”的名义从事迷信活动已经成为新的现象。记者调查发现，迷信从业者们通过种种手段包装迷信活动，让人们真伪难辨。其中的“拉大旗作虎皮”、把迷信伪装成“科学”、披“时尚”外衣等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如在兰州东部批发市场，几家小店摆放着类似于台式游戏机的算命机器，这些机器里都安装了算命的电脑程序。“电脑算命、科学预测”的牌子赫然立在旁边，只要交几块钱，您的事业、婚姻、1年的运势等等就会被打印在纸上。而在一家“咨询”公司，预测师则干脆把顾客的生辰八字输入电脑，只要几分钟，顾客一生的命运就被“预测”和“决定”了，这一招让很多文化层次较低的人趋之若鹜。专家称：这种“包装”后的迷信活动具有更大的迷惑性，人们现在更加需要擦亮眼睛。

其实，常常环绕在我们身边的这类事情，“大”到足以让我们感悟“生死悠关”这个词儿的，想起来也并不遥远：它就发生在3年前的春夏间！还记得“非典”期间流传的那些谣言吗？可知道有多少人“陷”入其中闹出了笑话？

笔者在应邀参与编撰《2004中国科普报告》、调研“抗击‘非典’时期的科普”这一专题时，不禁为映入眼帘的一连串事实所震撼：就在“非典”肆虐之时，一个“婴儿初生就说话、放鞭炮驱‘非典’”的流言在全国14个省份传开，并且在几天内就达到高潮。从已经公开的报道看，流言约在5月3日左右大规模出现，较早集中在两湖地区，其“版本”比较一致，均称家家户户必须放鞭炮、烧香除“非典”。5月6日是立夏，此流言达到顶峰：当日，安徽宣城、阜阳、亳州、六安等市传开流言，大放鞭炮；合肥地区还流传“雷公打死了蛇龙，当地即将地震”的谣言。5月7日凌晨，四川成都部分乡镇出现“必须在凌晨两点前喝绿豆稀饭才能防范非典”的流言。

在“非典”流行期间，类似的谣言与迷信还有许多。当然，最后是科学声音的传播，让那些迷信与谣言不攻自破。从科学与迷信和谣言的短兵相接中我们看到：在“非典”流行初期，由于病原不清楚、传播途径不清楚、渗透情况不清楚，且尚未找到特效治疗方法，社会上流行着各种猜测和传言，不少人思想混乱、无所适从，致使迷信和谣言有了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科学正面的信息缺位时，人们常常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自救信念，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小道消息。于是，各种

流言相比政府发布的信息就先入为主了。

此外,不该忽视的一个现象是,灾难在一些人身上引起了反应过度,如滥杀野生动物以杜绝所谓的“病源”等。钟南山院士曾指出,人们对待“非典”从最初的不以为然、麻木不仁到后来的惊慌失措、反应过度,都是由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引起的。这包括人们在“非典”流行期间因恐惧、无望而产生的盲目行为所造成的种种悲剧:一发烧男孩因畏惧“非典”而自杀;某大商场负责人相信在门口设立全身铜铁包裹的人像可防“非典”;最可惜的莫过于我国优秀举重运动员才力,他在沈阳期间由于担心自己所得的病是“非典”而不敢去医院医治,结果延误病情导致死亡,可最后确证他患的只是普通肺炎。就此钟南山感慨:如果人们的科学素质能够得到普遍提高的话,悲剧就不会再发生了。

笔者以为,“科学素质”是有着多重内涵的,绝非只限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或许不是科学知识本身,而是严谨而理性的思维方式。

五、伪科学最好的“解毒剂”

2003年那场“非典”灾难,其传播之快、危害之大、影响之广,令所有人措手不及。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重要、最紧迫的科普工作也启动了。事后许多人都说:正是在“非典”时期,才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科普、媒体和医护人员的重要与不可缺少。

的确,当科学的声音告诉我们:注意保持空气流通,勤洗手,尽量实行分餐制,在人多的地方要戴口罩……许多疾病就不会缠上我们。预防的知识我们掌握了,发热不一定是简单的感冒发烧,要去医院,并到发热门诊就诊;就医方法也知道了……人们按照科学方法做,“非典”恶魔受到了控制。人们相信只有科学是客观的、是真理,能帮助我们战胜“非典”,由此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解和尊重。

在抗“非典”的过程中,科学家对“非典”病原的认识出现过波折,对“非典”的诊治有过不同认识,对抗“非典”疫苗的研究也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快,对预防SARS药物的作用尚不能肯定……不必讳言,在科学的领域中仍还存在着许多未知的东西,科学的发展也会走弯路,科学突破需要一定的时间,科学结论常常也是相对的。在科学普及的过程中,就应该像这样把事物或事实的正、反面告诉人们,体现真正的科学思维、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一句话,科学是伪科学最好的“解毒剂”。避免邪说泛滥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使人们体悟理性的思维方式。

现在要问:为什么有人会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卡尔·萨根给出的一个答案是:人类理解和认知能力的不完善,常常使得我们极易被欺骗乃至操纵。当我们的怀疑与探究意识普遍淡薄时,我们便在不知不觉中滑入了迷信与伪科学的泥沼(见《魔鬼出没的世界》)。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并不是那么公正且富有理性的,而是要受到强烈的主观愿望和个人感情的影响。”

事实上,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人们的诱惑,往往减弱或取代了人们的批判性

思考；人们对于任何能够减少恐惧、带来希望的解释都是欣然接受的。尤其是当人们感到孤单和发生信仰饥渴时，特别容易轻信、盲从、受愚弄。

举例来说，所有的 UFO 事件其实都是人们传说的奇闻轶事，是人们自认为存在的东西。各种不同的观察结果表明，它们并非来自共同的原始目标。这些证据大多数是由于轻信、欺骗、幻想、对自然界缺乏了解所形成的。然而却仍有人声称：“没有被证明错误的东西必定是正确的，反之亦然。”例如，因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 UFO 没有来访问过地球，所以 UFO 是存在的，所以宇宙中另一个地方存在着智慧生物。

也有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解释不了的东西肯定不可解释，那是属于超正常的神秘之物。如一个业余“考古学家”宣称：因为他自己想像不出金字塔是如何修建成的，所以金字塔肯定是外星人建造的。这显然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歪理”。

甚至那些稍微有点儿理智的人有时也认为：连科学家都无法解释，那肯定解释不了。于是，用意念将调羹弯曲、在烧热的煤炭上行走以及“心灵感应”等等现象就都蒙上了一层超正常的神秘色彩。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倾向于抛弃有力的证据而拒绝承认已犯的错误，因为“揭露真相”毕竟剥夺了许多人对奇异事件想入非非的乐趣，更切断了有意造假或蒙骗者的财源。

萨根曾开列过一份仅仅是“代表”性的而非“综合的罗列”的 47 种典型伪科学和迷信的清单。对于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我们只要看一眼就绝无陌生之感，因为几乎都曾在国内的种种报纸、刊物、书籍乃至电视广播等媒体中见到过。无怪乎有学者感叹：近年来我们对于自产的伪科学和迷信的发扬，对于来自他国的伪科学与迷信的引进与本土化，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

美国《怀疑》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则从 3 个层面分析了人们之所以会相信一些怪诞事物的原因：（1）因为心中萌生了恒久不衰的希望；（2）在一般情况下，人的思维会走岔路；（3）在特殊场合中，人的思维也会偏离正轨。（见《人们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他还列举了诱导人们相信稀奇古怪事物的 25 种谬论。如“或者-或者”，陷入这个误区的人容易把世界“一分为二”，也就是说，如果你否定这种情况，那就得接受另一种情况。这是创世主义者所钟爱的策略。他们宣称：生命要么是上帝创造的，要么是进化来的，二者必居其一。所以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否定进化论理论，认为只要能证明进化论是错误的，那创世论肯定就是正确的。

再如“迂回的推理方式”，陷入这个误区的人所得出的结论或观点，仅仅是对其前提的一种重复。在基督教的护教说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谬误：上帝存在吗？存在。你咋知道的？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你咋知道《圣经》上说的没有错呢？因为《圣经》是在上帝的启示下写成的。换句话说，上帝存在是因为上帝存在。

英国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讲座教授、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 1998 年直率地指出：

由于电视、报纸等权威性媒体的煽动，占星术、特异功能和外星人来访

已经轻而易举地侵染到公众的潜意识当中。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种倾向恰好暴露出我们本性中喜欢稀奇古怪事物的一面。我们有时候自相矛盾,所以促进了这种倾向的发展。

道金斯进而又称:我们也完全可以安慰自己,因为真正的科学已经大大地满足了我们喜欢探索奥秘的心理,我们完全可以用教育的方法同迷信作斗争。他还提醒读者注意:预言者或相面者的话都是温和平淡、模棱两可和一般性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都能对号入座,而人们通常总是记得被言中的事而忽略没有言中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在面对一些巧合事件时坚定我们的立场,因为一个老练的骗子最拿手的事,就是让人们往一件事的对立面上去想。”(见《解析彩虹——科学、虚妄和玄妙的诱惑》)而这当中是有陷阱的。

199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乔治·夏尔帕克(George Charpak),在2002年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犯错误好象是明显的事实,那么,对于犯错误的情况,往往就容易被忽略。(见《魔法时刻:超自然的科学解释》)

而巧妙和滑头的做法有时是用冠冕堂皇的形式展示出来的。夏尔帕克给出了“深层效应”的称谓,并作了这样一个概括:一段话的意思愈是空泛、深奥,听这话的人便愈能认识自己,愈能跟自身情况相“对应”。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之:古代一位预言家对某国皇帝的4位王子中的一个星相迷——达拉王子,许下了他将继承王位的诺言;朋友对他这种轻率的预测大为震惊,他的回答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达拉登基我发财,要么是他被击败,然后给人杀死,这样我对他再也无所畏惧。”

作为一个对照,不妨举一个我们国家的例子,就拿看“风水”来说吧,民间有一首讽刺风水先生的顺口溜,颇为耐人寻味:风鉴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若是真有龙虎地,何不当年葬乃翁。

我想,这里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夏尔帕克在其反伪科学著作的最后一章中,专门辟有一节,名为“科学家与记者,同样在战斗”。他对媒体既抱有热切的期望,同时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认为,迷信是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除非它们被当作有价值的科学现象介绍。“我们正在进入新千年中为真理而战的新阶段。传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接下来他写道:

……在这样的行为中,传媒人物应该严肃思考中立和负责的概念。实际上,上述传媒的许多作者(指为一些荒谬言论鸣锣吹号的记者),有一种令人气愤的倾向:他们以“有必要”保持中立为挡箭牌,向我们报道一些缺乏认真调查的东西、一些“未经考虑”的信息,其借口是:公众会自己做出判断的。他们忘了,或者是假装忘记了,批判精神在没有足够的信息或不够客观的情况下,只是一片空白。由此产生了骗人的求助于“中性立场”的做法。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真实开始变得有点儿太虚幻了……这个“真实”的镜头播出以后,触动了一些人的思想,他们往往没有察觉到同样羞耻的骗术。对超自然现象的

某些电视报道，把一些所谓的“真实”的东西搬上荧屏，记者的道义何在？

在夏尔帕克看来，媒体是伪科学“病原体”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也是与这些“病原体”作斗争的最佳工具，“它们面对着矛盾和责任，不能丧失任何希望。”

有这样一种说法：由于我们的文化过于注重经验和实用，而忽视超验和非功利的理论，难以建立起严谨的理性思维体系，所以我们缺乏有利于克服生活中的恐惧的理性工具，于是便常常仰仗非理性的工具。

另一方面，我们敬畏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神，我们畏惧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鬼，于是又常常陷入了自己编织的圈套。更应该警惕的是：我们害怕变化、害怕孤独；思考的惰性又使我们宁愿放弃思考，所以我们干脆去听从众人；而如果人人都这样去想的话，所谓众人的想法，实际上也就成了一个或少数几个煽动者的想法……这一切，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反思吗？

其实，“理性”是个舶来品，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对其有着不同的理解：或把理性看成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或将理性上升为融知性与感性为一体的先天形式；或将理性仅仅视为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按照国外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人的理性，如果有的话，就在于尽力给自己所见闻到的事物寻找一个合理性解释，进而形成他自己的眼光和图景，并积极地随着外界调整。

神秘思维似乎总是先于理性思维而出现。对一个人来说，信仰是重要的，但要想不“离谱”，恐怕还得从属于理性。中国哲学家金岳霖在《论道》里所提出的“情求尽兴，用求得休”，大抵也概括了理性的要义。

在即将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三联书店新出的《美国心灵——关于这个国家的对话》一书，里边登有一篇记者在1989年与科普大师、反伪科学斗士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对谈。记者问：“您过于相信理性，这样会不会感到不适呢？”阿西莫夫的回答是：

我不能一下子将这个问题说清楚。你知道，也许是吧。但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的东西来让自己相信。你可能会说按照信仰。可信仰又是什么呢？信仰这个东西并不是要我们必须接受或非同意不可的。我有我的信仰，你有你的信仰。我不能将我的信仰传递给你；反过来，你也不能将你的信仰传于我。

至少就理性而言，还存在一种可以传递的可能。我们可以根据多数人认可的逻辑规律来进行理性的传递。因此，在理性中，还有一种我们所谓不得不同意的论点，也能找出一些证据。

如果你不按理性行事，你又能按什么行事呢？

作者简介

尹传红，科技日报经济特刊副主编，主任编辑，北京市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E-mail: asimov19790319@yahoo.com.cn。